



国家汉办1998~2000年科研项目

西方人早期 汉语学习史 调查

[上]

张西平 李 真 等编著
王 艳 陈 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国家汉办 1998 ~ 2000 年科研项目

西方人早期汉语 学习史调查 (上)

张西平 李 真 编著
王 艳 陈 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张西平等著. - 北京: 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3

ISBN 7-5000-6785-2

I. 西… II. 张… III. 汉语-言语学习-历史-调查研究-西方国家 IV. H19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1752 号

责任编辑：李玉莲

责任校对：安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88372203)

网址: <http://www.eeph.com.cn>.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排版

河北省鑫昊印刷厂印制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3.75 字数: 838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00-6785-2/H·111

印数: 1-1100 册

定价: 100.00 元

序 一

由张西平教授与几位年轻同志一起完成的这个课题，原本是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研究项目，属于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范畴。我对此毫无研究，基本上是个门外汉，实在不配写什么序。但是张西平教授要我一定写一点，而且说这个课题是在我的启发下开始的，不写有点说不过去。这么一来，我倒无法拒绝，只好勉强说一点情况了。

话得从1993年说起。那一年，我受国家教委派遣，与我妻子一同踏上美丽迷人的意大利国土，进入历史悠久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任教。那时我已经54岁，说老人还太早，却已过了半百岁月，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都不能说是浅薄无知。但是，当我临行前看了不少有关意大利的资料，而且到意大利跟那里的同行稍有接触之后，我不得不为自己的浅薄无知而汗颜了。原来意大利的汉学成就竟如此巨大，意大利的汉学家竟如此众多，我所任教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竟是意大利的三大汉学重镇之一，名震欧洲的汉学泰斗兰乔蒂先生就在这所大学执教……所有这些，在我数十年的经历中居然一无所知。我们这些人都是对自己的文化有些了解的，谈起子丑寅卯或许也能说个一二三四的，但却偏偏对国外研究我

们母体文化的学者毫无了解；我们天天在谈论自己，却不知道别人如何谈论我们；我们天天在评价自己，却不晓得别人如何评价我们。这能说我们是够格的学者吗？这能说我们的知识结构合理吗？这能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准确吗？

这种无知或许可以归咎于历史，但却不能再埋怨于现在，更不能留遗憾于未来。我们的国家，已经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我们正与世界各国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的学术不能再是一个闭目塞听的“围城”，我们需要睁大眼睛，敞开胸怀，了解和接纳一切有益的学术成果。在这样一种启示和感受之下，我于1995年底结束了在意大利的任务，回到我所供职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这时，学校的领导要我担任当时中文学院的院长，负责对外汉语教学专业和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工作。我感到，对外汉语教学这个专业，离不开对境外中国文化传播史的了解与研究，离不开对国外汉学家的了解与研究。如果这个专业的毕业生，仍然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流传及影响一无所知，仍然要等到身在海外才能对海外汉学有所了解，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毕业生。因此，我在征询了许多教师的意见，估量了我校特有的优势之后，正式向学校建议成立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就是搜集和整理世界各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情况，逐步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和规律；为国内学术界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参考。同时也想为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学生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以便使他们在学习阶段就能对海外汉学有某些了解。

“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自1996年成立以来，在张西平教授及其他几位教师的努力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由于中心的人力、财力都有限，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主要还是编辑出版海内外的一些相关著述，而且还是从海外汉学的

源头——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做起，当然也不排除对当代成果的翻译和出版。西方传教士在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研究海外汉学必须涉及的一个群体。文化交流向来是一种互动的行为。这些传教士为了在中国顺利传教，就必须学习汉语，研究汉语，也就必然把汉语和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著述。但是，长久以来，我们既没有太重视，也没有去研究。为了使“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工作范畴与日常的对外汉语教学结合得更加紧密，我就与张西平教授商量，能否开展“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调查与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科研与教学密切结合的好主意，于是就找了几位年轻同志一起策划，并且向国家汉办申报了这个课题。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课题终于得以完成，初步有了这么一个成果。不能说这个成果有多么成熟，也不能说这个工作有多么完善，但我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界以及中国文化研究界都能留心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会对应该知道的东西缺乏了解吗？

姑且作序。

程裕祯

2002年壬午夏于金台路寓所

序 二

西平兄从罗马来电话，告诉我他主持编著的《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一书已经付梓，并向我索序。对于他的大作的出版，我是要热烈祝贺的，但让我写序，我却感到惶恐。虽则惶恐，但初读本书时的喜悦与感佩之情却再一次油然而生，再一次使我兴奋不已，感到还有些话要说，所以便不揣浅陋，应承下来。

2001年底，我曾经有幸拜读了这部书的打印稿。当时我写下这样两段话：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还处于学科刚刚形成的时期，因此不少方面仍然不够成熟，特别是作为一个成熟学科应该有的学科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这一方面有条件、资料的原因，一方面也有认识上的原因。张西平先生主持的课题，从一个侧面开创了学科史的研究。

明代以降，西方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无疑促进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发展。耶稣会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而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很值得我们今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整理、研究。张西平先生做的工作，在搜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条分缕析，初步理出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研究汉语的历史的脉络，

对他们的成就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这一工作显然会推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为了完成这一工程浩大的课题，西平和他的同事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又会遇到多少困难。因为对汉语作为外语学科史的系统研究，他们是最早的开拓者，他们几乎要从最繁杂的资料工作做起。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厚重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做了出色的工作。而这一课题从立项到完成，仅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实在是令人敬佩啊！

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史的研究，过去只有一些零散的材料，但有些材料是很有价值的，如武柏索（1988年）写的《欧洲第一个汉语研究中心——古老而年轻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对清同治年间两度赴意大利教汉语的郭栋臣的介绍，美国学者崔颂人（1994年）对中国赴美任教的第一位汉语教师戈鲲化的介绍，以及李振杰、舒乙等先生对老舍20世纪20年代在伦敦的汉语教学活动和他编写的“灵格风”汉语课本的研究，都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入。我们高兴地读到了张宏生（2000年）编著的《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一个小小的戈鲲化热，甚至对国际汉学的研究热，其中也包含着历史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研究，例如阎国栋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第一位在俄国教授满汉语的中国人》一文就翔实地介绍了周戈在1738年至1840年（清雍正朝）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满汉语教学活动。而对某一方面作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据我所知，只有两项，一项是北京师范大学董明先生的研究，另一项就是西平主持的这个课题了，二者各有特色。西平先生的项目，概述了西方人对汉语的观察

和研究成果，介绍了教师和教材的情况；同时又有个案的研究，即对马若瑟、艾约瑟、毕利干的著作的研究，还译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和书目。总之，他已经勾勒出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包括汉语教学史——的轮廓。

以上情况，特别是这本《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以前说起研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史的研究，觉得是空的，前途渺茫，不知道能研究出个什么结果来。现在不同了，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有待大力开发的“富矿”。比如，本书的研究，仅揭示了明清两季西方人学习汉语的情况，其实，东方的韩国、日本，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更长，建树也很丰厚。我国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也是有渊源的。这些也很值得研究。把这些研究透了，一部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史就会水到渠成。再如，任何一门学科的历史，都离不开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西平的研究，已经涉及不少，但这个方面其实是开放性很强的领域。本书的专题研究，只评介了三部著作，而值得评介的恐怕远不止这三种，远的如《西儒耳目资》，晚近些的如《语言自述集》等，都是很有影响、很有分量的著作。至于日本、韩国，可以入史的汉语教材当不在少数。前几年出版了北京大学王顺洪译的日本学者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两本书，后者所附从1867年到1945年的书目收入汉语教科书和工具书达1437种，而两本书中涉及的中国教师和中国作者，据我的统计，达70余人，其中不乏突出的人物。20世纪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前50年的研究很少，只有对老舍的介绍和对当时外交人员的汉语教学的介绍（见殷华《中国

早期的外交人员汉语教学》，载《世界汉语教学》1991年第3期），实际上，当时我国的一些大学也有对外国人开汉语课的，在国外，许多我国的学者都曾从事过汉语教学，像还健在的季羨林先生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期间就曾正式受聘任汉语教师。这些也值得研究。20世纪的后50年则是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的时期，更是值得研究。这方面，只有吕必松先生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本书。但这本书在写法上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我们只这样粗略地一说，就可看出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史是一个多么值得开拓的广阔的领域。

读了本书，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作为一个学科，太需要学科史了。从本书可以看到当年西方人对汉语的观察和他们学习汉语的许多经验之谈。这些对我们今天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宝贵的。研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史，跟研究其他学科史一样，是要总结这个学科的发展规律，供今天借鉴，少走弯路（甚至回头路），使今天的教学与研究建立在更高的基础之上。我读着书中那些传教士几百年前学习汉语的体会，以及他们对后来学习者的忠告，感到非常亲切，他们当时思考的许多问题，跟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有许多共同之点。如果我们早已有一部哪怕很简单的汉语教学史，我们在研究今天的汉语教学时，不是就可以免去很多重复劳动，从而提高效率吗？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学科史研究，尽管本书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要继续脚踏实地，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个领域开拓。要作出成绩来，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急躁不得，不能急于求成。前不久，有人著文，将历史上几种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汉语教材和工具书凑在一起，按年代顺序串起来，说是汉

语教材的不同阶段，宣称这就是对外汉语教材的历史，甚至把工具书也说成汉语教材的一个发展阶段。这种浮躁的情绪，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学习西平先生和其他几位作者的扎实、认真、严谨的学风。

鲁健骥

2002年6月23日

序 三

16~19 世纪西方人眼中的汉语汉字

一

西方人何时开始接触和学习汉语汉字？像历史上许多“谁是第一个”的难题一样，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最初的情形已无可考，甚至像马可·波罗这样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其书其事的真实性也一再有人质疑。可以确证的史实是，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从此便展开了中西之间经常的语言交往。起初不过是自发的日常交流；继之而有目标明确的语言学习；再后来，便建立了讲授汉语的教会学校。1594年创办的澳门圣保禄学院（Colegio de S. Paulo），成为培训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机构，而汉语文自然列为必修的课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名士，赴华传教前曾在这里接受训练。前不久我去澳门参加“英语教学、翻译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理工学院），期间寻访了这所学院的遗址。所有的建筑均毁于1835年的一场大火，惟独院内

圣保禄大教堂的正面石墙 (facade) 残存至今; 而这面上下四层、既壮且美的大墙, 因其状颇似中式牌坊, 得了个“大三巴牌坊”的土名。但“大三巴”既非纯粹的土产亦非完全的洋物, 从那上面刻着的各种浮雕, 西教人物、葡国海船、中国龙、日本菊等, 以及依稀可辨的中西文字, 可知它是早期东西语言文化合汇的产物。

西方人对汉语的认识, 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二

当“大三巴”落成之时 (1602年), 利玛窦入华行教已近二十年。这时的他已经熟通汉语, 不但听、说自如, 长于论辩, 而且深探儒学, 广涉经史, 并喜好用中文写作。据时人记叙, 利玛窦的汉语文功力远在一般中国读书人之上。当然, 他所留下的中文作品, 无论是著述体的《几何原本》, 还是散文体的《交友论》, 或多或少都有中国学者参与。特别是厘定术语和修润文句, 没有中国学人的协助是难以想像的。

学习并通晓一种异族语言, 是对之进行研究的基础。但学习和研究也是同步的过程。通过编写语言读物和外汉字典, 产生了第一个拼音草案。据本书所叙 (“概论”第三章, 第一、第三节), 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 1543~1607) 与利玛窦在合编《葡华辞典》(1588年成书) 时已拟出一个方案, 尝试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较为成熟的框架则出自利氏的《西字奇迹》(1605年), 并体现于王征、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的《西儒耳目资》(1626年)。西士编写这些著作, 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方便自己, 连

带宣讲西字的好处，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语言学上的努力，试图超越反切，彻底解决汉字注音的问题。明末的中国学人对西土的求索精神钦仰至甚，对他们的音学创获也倍加推许。《西儒耳目资》的校梓者王徵在书前的《释疑》篇中写道：“夫西儒梯航远来，学我华言，不数年间辄得此中文义”；张问达为《西儒耳目资》作序，称赞作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叶韵直截简易，绝无一毫勉强拘碍之弊”。这样的褒扬有些过头，这样肯向人学的精神却很可贵。而最值得一说、却往往被淡忘的一点，是这些开明士子的宽阔胸襟和远大志趣。如张问达谓《西儒耳目资》“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万国之风”。王徵不仅欣赏金氏所创的“万国音韵活图”，因为它“能包括万国语音”，更期望能将西土的拼音方案“颁布海宇，传之无穷”，认为如此有益而便利的物事，“足以彰我明千古来同文之盛治”，中国人理当吸纳，“谁复问中西哉？”这跟若干年后即康熙初年杨光先的怪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境界相去何止千里！

四个世纪后的今天，拼音字母已成为汉语必不可缺的注音工具，广泛用于从教育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如王徵当年所望，它已“颁布海宇”，可以“传之无穷”。如今的中国，又有几个人会强判中西，只因它是舶来品而拒之门外？即使还有几个，又怎能阻挡中西合汇、文明挺进的大势？

三

在用西文字母拼注汉字的同时，传教士们也开始用西洋语法的概念和方法来分析汉语，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

究领域——汉语语法学。

中国旧学体系中本无语法之学。属于国学范畴的语言文字学过去惯称“小学”。小学底下分出三门：文字、音韵、训诂，分别探究汉字的三个要素：形、音、义。清儒段玉裁有一段话，讲透了这门学问的三分法：“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古音、有古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广雅疏证》序）。自秦汉到清末中国两千年的语言文字研究，就是这样以字为纲、以古为尚，于形、音、义之间研磨推求，在一统三分的框架中缓步前行。这一学术体系生命力极强，从外部殊难撼动，直至清末受到西学冲击，更兼马建忠撰著《马氏文通》，在旧学之外辟出一块新地，三分鼎立的格局才显出松动的迹象。而马氏能够撰成《文通》，无疑是因为他有西学背景，有西洋语法的范式可循。对于模仿西法这一点，马建忠并不讳言，他说得清楚：“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例言）；“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后序）。然而，关于他是否借鉴过此前西士所著的汉语语法，甚至是否知道有这样的语法存在，马建忠却从未明言，于是在《文通》来源的问题上留下了一个疑团。不过这已是另一性质的问题，跟这里说的西方人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关系不大。无论如何，这种研究若从多明我会士瓦罗（Francisco Varo 1627~1687）撰成《华语官话语法》（1682年）算起，到《文通》问世之时（1898年）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

据多明我会派的会史记载，早在1592~1593年间，教士胡安·柯伯（Juan Cobo）就编过一本《汉语语法》。但这部书稿及以后数十年里类似题目的手稿都未能刊刻，以至散佚不存。第一本刻印成书并得以存世的汉语语法，是瓦罗的

《华语官话语法》（1703年，广州）。瓦罗于1649年来华，在福建等地传教达38年，眼见新来教士在学习汉语时障碍重重，遂用西班牙文编写了这本语法书兼课本。最早的官话语法出自多明我会教士之手，并非偶然的事件。该派提倡公开布道，宣教对象多为平民百姓，因此尤其留意通俗口语，置言谈讲辩于首位。而耶稣会士则倾向走高层路线，出入士人社会，通过私下交谈宣教收徒，所以注重学术著译，偏爱书面语言，强调读和写。瓦罗在书中描述了以南京官话为基础、杂有闽方言特点的近代汉语，并且只谈语言问题，不教读书识字，就是重听说、重口语的结果。

自然，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瓦罗的《语法》显得粗浅，偏识疏误也多。可是我们要想到，瓦罗及其前辈对汉语语法的分析是真正意义的初探，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特别是，他确立了词类体系，区分出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叹词。这个系统跟现代汉语语法通常认可的词类系统区别已不大。关于瓦罗此书，我曾写过一篇简介，发表在《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上；认真的研究则由清华中文系马又清同学开了一个好头：今年四月，他完成了硕士论文《瓦罗〈华语官话语法〉研究》。本书第二编所收的《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研究》，底稿是于苒同学2001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马若瑟〈汉语札记〉研究》则是李真同学撰写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像这类专书专题的研究，还要继续做下去；至少得把各时段的代表作都研析过，才谈得上梳理西方早期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线索。

西方的汉语研究起初纯粹是传教士的工作，或者说是他们从事宣教活动之余的副业。比如以上提到的几部汉语语法书，都是来华教士的作品。当传教士的著述在欧洲流传开

来，引起各界注意，促使更多的学者转向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时候，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也就势在必然。这门学科便是汉学。关于汉学如何形成和发达起来，学界已有很多探讨，专著也已不少，而所有讲述汉学史的著作都会说到汉语研究；另一方面，在有关西方语言学史的著作中，汉语研究也是一个必谈的话题，因为，对于西方语言学的进步和语言观念的变革，发现、认识和研究汉语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四

就在利玛窦刊行《西字奇迹》、向中国学界宣扬拼音文字好处的同一年，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在英伦发表《论学术的进展》（*On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一译《崇学论》、《进学论》），表露了不满于欧洲语言文字的情绪和效法汉语汉字的愿望；其后又在《新工具》（1620年）里作进一步阐述，从而在欧洲上下引发了一场关于普遍语言文字的思潮。

欧洲诸国民族林立、交通频繁，自古对普遍语言（即族际通用语）就有一种天然的需求。中古时期，拉丁语部分满足了这一需求，在各国宗教、政法、文教、科学等领域广泛通行。文艺复兴以降，新兴民族语言的地位迅速提升，拉丁语不再惟其独尊，往日的通语功能也渐趋弱化。但对普遍语言的需求依然存在，并且由于同美亚通航和拓展市场的需要，更须有一种能够畅行世界的语言。另一方面，迅速推进的经验科学要求有更为清晰、精确的语文工具，以致哲学家和科学家纷纷提出革新语言、改进文字的主张。普遍语言和文字的创制，于是便成为欧洲学界众目